

# 香港和日本—— 亞洲城市現代化的 相互影響， 1841 至 1947 年

李培德 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名譽副教授

## 前言

香港雖為彈丸之地，但由於種種的歷史和地理因素，如濱下武志所指，香港具有強大的「網絡」功能，影響着中國和廣大的亞洲國家和地區，於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可見到香港「網絡」的作用。過去，我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上，大大忽略了香港與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其實，香港與日本有着很密切的交往，只要細心觀察，便會發現早於鴉片戰爭結束後的不久，在這個剛開闢的維多利亞新城裏，已經有日本船來港的蹤跡。從香港開埠到現在的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裏，港日關係可謂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總括而言，在 19 世紀香港一直扮演着日本於亞洲吸收西洋文明和觀察中國動態的「中介」角色。在日本實行明治維新以前，可以肯定地說，日本通往世界的交通航線，大多經由香港，也因為這樣的原因，日本對外界的認識，也多先經過香港。過去有學者提出，二次大戰前日本對香港的研究，多以收集情報為目的，筆者並不贊同。雖然日本對香港的關注多出於自身的需要，但也不能貶低於該時期出現的香港研究。相反，戰後崛興的香港研究，特別是對於香港中國人社會和亞洲網絡經濟兩方面，如仔細考量，都可發現有承繼早於戰前香港研究的痕跡。

本文是筆者與濱下武志教授合編，《シリーズ 近代アジアの都市と日本：香港都市案内集成》導言部分的中文版，該叢書的第一至六卷已於 2013 年 11 月由東京ゆまり書房出版，2015 年初將出齊餘下的第七至十三卷。

## 一、編輯《近代亞洲的都市和日本：香港都市案內集成》叢書的緣起

香港從 1841 年開埠到現在已有超過一百七十年的歷史，香港的地理位置在亞洲，但我們的思想卻在歐洲。香港與亞洲雖然有很密切的社會經濟關係，但注意力卻放在亞洲以外的地方。香港雖與亞洲國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息息相關，但我們的價值觀卻驅使我們「反認同」，在「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的思想影響底下，我們對「亞洲價值觀」看得很低。

此外，「中國中心論」（China-centrism）也一直干擾我們接受亞洲文化的態度。一般來說，我們只會說香港是「中西文化」（Sino-Western），而少去說「東西文化」（East-West）交匯的城市。為何我們會被「中國中心論」的價值觀主導，即中國文化代表了所有的東方文化？當然，亞洲文化是多元的，不可能只有中國一個國家的單元文化。眾所周知，亞洲近代歷史之變化，起源於鴉片戰爭，不僅揭開中國、香港歷史的新一頁，同時對日本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日本的對外開放，間接因為中國和香港。目前學界研究香港和日本的歷史，特別是因外部壓力而開放的歷史都會分別以鴉片戰爭、明治維新為起點，並不完全正確。因為《近代亞洲的都市和日本：香港都市案內集成》叢書（以下簡稱「本叢書」）

要討論的香港和日本的關係、香港對日本現代化之貢獻、日本對香港的侵佔等等，正恰恰在香港開埠之後一百年間發生。其中，最值得去探究的是日本推行明治維新之前，即 1841 至 1868 年的二十多年間，別小看香港在開埠後只有近二十萬人口的小城市，經香港華人社會「揉合」的「東西文化」，正是日本當時現代化過程中所要參考的。香港所走過的現代化之路，也就是當時日本政治、經濟、文化各界精英所要探求的。

亞洲的近代史，無疑與西力東漸有密切關係，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被稱為「天朝大國」，亞洲的小國包括蒙古、朝鮮、琉球（今日沖繩）、越南等都派遣朝貢使節，向中國稱臣。中國和日本雖然實行鎖國，但亞洲的國際秩序基本上是由中國來維持的。到了 19 世紀末，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再加上日本於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俄帝國，一躍成為亞洲的強國，中國原來維持亞洲國際秩序的角色逐漸被日本取代。到了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便成為亞洲的軍事霸主了。當然，因為美國的參戰，日本最後被徹底打敗，日本在亞洲的霸主地位又轉移到美國去，影響一直到現在。

一百年過後，香港對已經現代化的日本來說，所代表的仍然是屬於西方陣營但具「中國人網絡」特色的城市。從當時的軍事形勢來看，要堵截西方世界對中國抗戰的支援，因而要採取軍事占領香港的行動。不過，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日本占領香港是對

西方在亞洲的殖民霸權和中國人網絡世界的一種反撲和挑戰。

## 二、本叢書的內容重點

日本人於香港的活動，最早可追溯至 1841 年香港開埠初期。1868 年日本明治維新，要實行國家現代化政策，香港成為日本於亞洲發展商貿活動的最重要海外據點，日本充分利用了香港於人、財、物、資訊流通的網絡樞紐作用。1909 年東京高等商業學校編纂《香港通過商業調查報告書》，充分強調香港對亞洲經濟網絡所發揮的重要功能。到了 20 世紀初，日本人於香港相繼設立商會、學校、醫院、寺廟、新聞媒體，加上原來的使館、商社、銀行、航運企業等，一個完整的日本人社會於 1920 年代基本形成。1937 年作為日本於臺灣的最高統治機構臺灣總督府刊印了《明治初年に於ける香港日本人》一書，記錄了老香港日本人的生活體驗和回憶，為日本人的香港移民史留下重要的紀錄。

根據可兒弘明於 1991 年的統計，（註 1）日本於二次大戰結束前出版有關香港研究的書籍，包括翻譯和資料工具書共有 45 種，筆者於 2001 年的統計是 47 種，（註 2）兩人的統計大致相若。本叢書所收的資料可分為四個時期：（1）1850 年日本開國前夕至 1911 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該時期日本經歷明治維新，從香港吸收大量經殖民地華

人社會消化後的西洋文明；（2）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至 1937 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前夕，該時期香港的日本人社會逐漸發展成熟；（3）1937 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至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由於香港被認定是支援中國內地抗日的最重要後勤補給基地，日本對香港的觀察從未間斷，從日本國內來香港訪問的政府官員、學者等可謂絡繹不絕；（4）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於該時期日本軍事占領香港，展開了俗稱「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統治時期。

本叢書所收的資料，可分為五類：

（1）屬調查性質的，例如對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等某一個專題的調查；（2）屬工具和參考性質的，主要就日本人到香港旅行或日本企業對香港進行商貿活動而提供有關香港的各種訊息，此外還針對本地日本人社會提供有關居住香港的資料；（3）屬政治宣傳性質的，這一類的資料多出現於日本軍事占領香港時期，多為歌頌「大東亞」戰爭為目的；（4）屬學術研究性質的，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角度出發來討論香港，或香港與日本、與中國和與英國的關係，不過也包括一些趨向支持某一政策的公共輿論，這類觀點多通過社會媒體去傳播；（5）政府保存的文獻，例如《外交文書》和《領事報告》。值得一提的是，有關軍事戰略方面，例如吹捧日本如何成功奪取香港的書並未收入。（註 3）又或香港於日治時期

由「香港占領地總督部」發行的資料和工具性書籍，（註4）除了少數較高史料價值和能反映當時在港的日本人社會外，包括《香港・海南島の建設》（1942年）、《香港的經濟諸問題》（1942年）、《在香港日本人的參考》（1943年）和《軍政下の香港》（1944年），其餘的都未被收入。

本叢書的資料，主要來自不同時期日本的政府和民間機構，包括外務省通商局、臺灣總督府、滿鐵經濟調查會、東亞研究所、臺灣銀行、三井物產、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朝日新聞社、桐生屋商號等。此外，還包括多家日本人在香港的組織，計有：日本駐香港領事館、香港日本商工會議所、香港日本青年會、香港日報社、東洋經濟社、堀內書店等。這些資料對了解日本與香港、中國、英國多邊關係，或在香港的日本人社會，日本於近代亞洲的海外發展等等，都具參考價值。本叢書所收的資料均經過篩選，挑選的對象均為同類型資料中具代表性者，足可反映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對香港觀察和調查研究的具體成果。

### 三、19世紀亞洲國際秩序的重整

香港雖為彈丸之地，但由於種種的歷史和地理因素，如濱下武志所指，香港具有強大的「網絡」功能，影響着中國和廣大的亞洲國家和地區，於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可見到香港的「網絡」

作用。（註5）過去我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上，大大忽略了香港與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

如果說鴉片戰爭前亞洲的國際關係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來維繫的話，那麼鴉片戰爭就是破壞原來亞洲秩序的元兇，隨朝貢制度崩潰而來的歐洲殖民勢力從印度、東南亞延伸至東亞，使亞洲的歷史舞台除原有的中國人網絡外，更多了來自歐洲的英國網絡。朝貢制度雖被破壞，但中國人的網絡並沒有消失，華裔移民幾乎滲透亞洲的每一個國家，部分華商更與歐洲殖民勢力相結合，借助其於亞洲的影響力，將網絡加以延伸。日本是一個獨特的亞洲國家，她不僅沒有參加中國的朝貢體系，在豐臣秀吉時代，甚至要求在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和在果亞的葡萄牙總督向日本稱臣和差遣朝貢使節。此外，日本與中國的藩屬琉球一直保持微妙的關係。面對中國和西方於亞洲的強大網絡，日本不可能沒有反應，因此將20世紀前半的亞洲歷史解釋為日本對這種網絡壓力的反撲，並非沒有道理。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和日本都奉行保守的自我封閉政策，中國於明洪武14年（公元1381年）開始海禁，而日本則因於1637年「島原之亂」後實行鎖國。有趣的是，中日兩國在所謂「自我閉鎖」的政策下，對外界的接觸並未中斷。除了廣州和長崎被闢為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外，還使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獲取外界的消息。

從本叢書附表〈香港日本關係大事年表〉（本文並無收入）來看，1845年共有4名日本「漂流民」來港定居，打開了港日關係史的新一頁。這些被稱為漂流民的日本人為何會來到香港？到底漂流對他們來說有是甚麼含意？當時日本實行鎖國，如無日本官方的許可，日本國民不可出海。此外，還規定擅自離開國土的日本人將自動失去國民身分，因而對於日本人來說，一旦離開國土就等如永遠離別家鄉。

雖然是海禁、鎖國，但不意味這兩個國家對外界上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中國於乾隆22年（1757年）便於廣州實行「一口通商」，把全國的對外貿易集中在廣州進行，英國等外國使節來華亦須先經過廣州，然後到北京。日本的做法與中國相似，中、日兩國的政策有不少相同之處。日本是通過長崎，規定唐船、蘭船（指從荷蘭來的船），及少部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預先得到日本政府同意下，來日進行有限度的「勘合符」貿易。所謂「勘合符」者，意謂這次來日貿易完畢，便發給一張半截符契作為憑證，待下次再來日本時，便可以此半截符契對勘。一般人都會有一個錯覺，以為日本鎖國，對外界便一無所知。其實不然，位於日本南端的長崎港，由長崎「奉行」（即今天的市長）管轄，他要求所有到長崎泊岸船隻的船長，在登岸後必須向他彙報在航行期間的所有經歷和對各地的觀察。長崎奉行根據這些「情報」整理成為一種稱為《風說書》

的情報資料，呈閱位於江戶（今天稱東京）的幕府大將軍。換言之，日本幕府只要坐鎮江戶，不須出外航海，便可掌握最新的亞洲各國情報。（註6）為甚麼日本會特別關心亞洲？這不僅因為中國曾於元、明兩朝攻打過日本，更因日本是一個位於亞洲東北邊陲的國家，她必須了解亞洲所發生的事情來釐定或調整自己的政策。

上文提及的日本漂流民，所謂「漂流」，筆者認為這只是一個藉口，因為不能合法出國，所以只能說是因天氣影響，被颱風「吹」離本國。這幾名日本漂流民先漂流至澳門，然後來到香港。很明顯地他們亦會為自己打算，當時香港已經開埠，英國人想把香港發展成為亞洲的商貿城市，把他們吸引到香港發展。

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主要以朝貢關係來維持與亞洲國家的關係，這被稱為「華夷秩序」的國際關係成為亞洲國際秩序的重要環節。參加朝貢的藩屬國尊稱中國為「宗主國」，中國的皇帝為「天子」，自己為屬國，為中國的臣子。根據濱下武志的研究，中國要維持這種國際關係需付出不少經濟上的代價。中國從朝貢國所得到的貢品往往要加倍奉還，以表示天子對屬國的恩惠。（註7）而且朝貢制度並非適用於所有要籠絡的亞洲國家。首先，日本並沒有參加。其次，作為中國的藩屬，琉球既向中國稱臣，但同時亦派遣使節去日本，實行兩面靠攏。第三，中國另一屬國越南，亦曾要求鄰國察

國（即今天老撾）向她稱臣，當然越南並沒有得到中國的同意去進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僅一直沒有參加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國際秩序體系，相反在豐臣秀吉時代（1537-1598年），更要求在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和果亞的葡萄牙總督向日本派遣朝貢使節，嘗試在中國以外另立一個以日本為主的國際關係網絡，以與中國抗衡。顯然日本對中國於亞洲的舉動是相當留心觀察的。毫無疑問，當鴉片戰爭把亞洲原來的國際秩序加以破壞時，日本很自然就會想到中國在被打倒以後，到底會由誰來代替她的位置，這不僅影響到日本的自身安全，更令人擔心今後由誰來主宰亞洲國家的命運，這一影響對日本來說是震撼的。鴉片戰爭後，於廣西崛起的太平軍攻陷南京，建立「太平天國」，挑戰清政府之統治，加上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燒毀北京圓明園，使日本幕府益加相信只有選擇對外開放，早日實行國家現代化，纔能避免重蹈中國被欺侮之厄運。

日本雖然於1637年起實行鎖國，斷絕民間與海外的一切交通，但不等於幕府不知道海外所發生的事情。據統計，由長崎奉行撰成的《風說書》，於1840至1844年間共有19件是討論中國如何嘗試禁絕鴉片、英國在中國的軍事侵略和「南京條約」的內容等。可想而知，日本對中國、亞洲動態的變化是非常重視的。作為天朝大國的中國，竟然敗給只有幾個小島的英國，令日本舉國震

驚。當然，香港作為中國第一個被割讓的殖民地，日本是不會不加留意的。此外，因鴉片戰爭對原來亞洲國際秩序的破壞，日本出現了一種國家危機感，基於《風說書》提供的情報而寫成的《海外新話》和《海陸戰防錄》，都是提倡日本國人的危機意識，這對以後日本歷史的發展影響極大。（註8）

#### 四、香港對日本現代化之影響

香港和日本由於不同的歷史背景，往往成為影響兩地關係的主要因素。早於19世紀日本摒棄鎖國政策時起，為求早日實現現代化，實行明治維新，由過去以中國為模範轉移向西方學習，香港在這歷史轉折的過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主要原因有：第一、香港的城市現代化歷程比日本早，不僅有完善的海港設施，更有先進的通訊設備和大眾傳播媒體，因應了外國商社、傳教士和外交官等在亞洲地區活動的需求；第二、香港地理位置適中，更由於外貿的關係，香港與倫敦和與三藩市的海上航線，都發展得比較早，並且吸引了不少航運公司在香港開展他們在亞洲的航線。

雖然日本和美國於1854年簽訂通商條約，但日本第一個開港城市橫濱要遲至1859年才正式開放，比香港開埠遲十八年。在對外交通航運方面，香港遠比日本發達。早於1849年香港已有到上海之航線，1850年到倫敦，1864年經上海到橫濱，

1867年到三藩市。與香港相比，日本的海外航運起步較遲，且控制權不在日本。日本要到1875年才有到上海，1879年到香港之航線。(註9)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肯定的說，香港是日本連接歐美的重要航運樞紐。據考證，在明治維新前夕共7次幕府派遣的外交使節中，包括1860年新見正興到美國、1862年竹內保德到歐洲六國、1864年池田長發到法國、1865年柴田剛中到法國、1866年小出秀實到俄國、1867年小野友五郎到美國、1867年德川昭武到法國等，無不取道香港。這批代表日本政府的高層人士，或在去程時在香港中轉，或在回程時在香港停留訪問，他們都會把在香港的見聞帶回本國，因此說香港是日本接受外界訊息的重要渠道並不為過。就算到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對外交通航運仍然掌控於外資航運公司，香港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岩倉使節團對近代日本的影響已為一般史家所公認，需要指出者，使節團不僅遊歷歐美諸國，在回程歸國時也遊歷了好幾個亞洲國家和城市，並作深入和認真的考察。使節團於1871年12月離開日本，1873年8月經果亞、新加坡、西貢抵達香港，停留兩夜三日後去上海，於9月初返抵長崎。雖然岩倉使節團的重要意義在於明治初期日本對歐美國家的考察，但使節團在歸航途中所經過停留的都是西方列強於亞洲的殖民地或租界。不難想像，使節團所獲得的印象顯然是亞洲備受西方列強控制，對日本毫無疑

問是一種「威脅」，間接加促了日本成為現代化強國的步伐。

要達到現代化，必須先了解西方社會的實際情況，語文翻譯似乎是首要處理的問題。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英對照的教科書《智環啟蒙塾課初步》，(註10)第一份專門介紹西方事物的中文刊物《遐邇貫珍》，(註11)和中文報紙《香港船頭貨價紙》都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視。於明治維新前由日本高級知識份子進行研修的機構「蕃書調所」抄錄成日本版，於1853年刊印成《遐邇貫珍抄本》、1859年印成《官版香港新聞》，於日本廣泛流傳。(註12)另外，由香港德籍傳教士羅存德(William Lobscheid)編纂的《華英字典》於1866年開始刊印，亦受到日本政府和知識界的注意，不少英文詞彙的漢譯，例如漢語「銀行」一詞，便出自這套《華英字典》。(註13)

1854年香港開埠後十三年，當美國開赴日本的培理(Matthew C. Perry)海軍艦隊停泊香港等待補給之際，廣東南海人羅森得到他的老師外籍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介紹，充當艦隊的翻譯，協助美國打開日本鎖國之門。由於羅氏曾參予商訂「日美汽船通商條約」，成為歷史上第一位與日本官方接觸的香港華人，最終獲得日本朝野的尊敬。羅氏所著的《日本日記》，(註14)後來被衛三畏翻譯成英文，收入《培理艦隊日本遠征記》，也成為了近代中國人所寫的第一部日本見聞錄。(註

15) 為甚麼羅森會被選中參與美日和談？他的英語和日語水平如何？據現存衛三畏的資料顯示，培理當時認為衛三畏的日文水平足以當艦隊的翻譯，但對羅森本人卻沒有太大的信心，不過對羅倚重的是漢語而非日語，例如衛三畏曾對羅的表現加以評價，寫道：

我的中文秘書羅先生向我打聽有關中國的消息。……羅很有才華，他常常在日本人的扇子上題詩，並和許多日本人交上了朋友。他和日本人交流一般是通過「寫」的方式來進行，因為很多日本人能看懂中文，也能寫中文，但是不會說。……羅對工作很有熱情，與當地人相處也很融洽。在當地人看來，羅先生是他們見過的最博學的中國人。自羅在他們的扇子題下優美的詩句以後，他們就願意與他切磋中文了。（註16）

由於羅森著有《南京紀事》，紀錄了太平天國於南京的情況，後來日本思想家吉田松蔭將此書譯為日文，書名改為《清國咸豐亂紀》。這書對日本影響極大，使日本朝野明白，作為天朝大國的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如何開始衰落，地方動亂已是一發不可收拾。因此，羅森的名字在他到達橫濱之前很可能已為日人所熟悉。羅氏作為華人知識分子，乘坐美國軍艦前去日本叩關。當然在美國來看，培理艦隊的叩關是相當成功的，因為

完全不需武力便能與日本簽訂「日美親善條約」。日本願意開放部分港口與美國通商，容許美國人進入日本，從此打開了日本的國門，而其他歐洲國家如法國、葡萄牙等，無不相繼以「日美親善條約」為藍本，向日本要求相同的待遇。故此，我們仍不得不說，1854年羅森隨美國培理艦隊到日本，協助日本完成了一項偉大的任務，使日本鎖國的歷史畫上句號。（註17）

不少人覺得羅森是一個偉大人物，因為他是第一個中國人，也是第一個香港人打開了日本的國門，影響日本近代史的發展。羅森將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寫了一部《日本日記》，這書被歷史學家譽為第一部由中國人以中文撰寫研究日本的著作，評價甚高。筆者並非要反駁，但欲指出羅氏見重於日本朝野並不是他的高超英語或日語水平，而是漢語和對漢學的高深學問，當培理艦隊抵達日本時，日本的官員去問羅氏有否到過美國時，他答道：「我在船不過三月也，但我不管其事。倘我能言，我必教之以仁義。」這一句話可謂十分精景，到底是他不會英語，還是他在船上地位低微，沒有說話的資格？羅氏身為中國知識分子，所到之處均受日本漢學家歡迎，但問題是他怎會乘上「夷船」去幫助「夷人」（指美國人）來欺負受儒家思想洗禮的日本？因此，筆者相信「倘我能言，我必教之以仁義。」這一句話的真正意思，實為羅氏為自己轉圜。其實，羅森到了日本之後結識了一批日本政界及文化界人



士，他與這些人的交往一直維持到 1860 年代。據說日本天皇還贈送了幾幅名畫給他，及禮聘他為日本政府顧問。看來羅氏是非常成功的。無可否認，羅氏並不通曉日語，羅森是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漢學地位和價值觀主宰着整個日本的上層社會。換言之，羅接觸日本的文化人士，猶如見到自家人，大家閱讀的儒家經典、欣賞的事物大抵相同，畢竟羅氏訪日確實帶來了一些影響。羅跟隨艦隊不僅去了橫濱、橫須賀，還去了北海道，並從北海道帶回一些昆布樣本回廣東、香港。羅氏離開日本後，有好幾位廣東商人便拿着他帶回來的昆布樣本到日本採購。（註 18）

明治維新伊始，日本實行經濟改革，急需建立新的現代金融體制，取代幕末以來紊亂的金融制度，香港在這方面作出了不少貢獻。當時於大阪新建的「造幣寮」即後來的造幣局，發行十進制新貨幣，所用的行政管理人員、工程師、技師、機器、設備、廠房建築設計等等，均來自於 1868 年倒閉的香港造幣局（Royal Hong Kong Mint）。當時日本新鑄的貿易銀元，其貨幣單位「圓」的名稱，與香港當時的流通貨幣「圓」有很密切關係。其實，現在通用的「円」是「圓」的略字。新的貨幣推出後，香港的滙豐銀行便曾協助「日圓」在亞洲多個城市流通。（註 19）早於 1902 年英日同盟結成之前，香港的英人總督便曾多次官式訪問日本，例如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ey）便曾於 1878

和 1879 年兩次訪問日本。日本政府更嘗試說服英國，使「日圓」成為香港的合法流通貨幣，可惜最後並沒有成功。（註 20）

有關造幣廠向日本出售的過程頗為複雜，首先是日本派遣一個代表團來港考察，了解造幣廠的選址、入口設備、廠房建造等情況。日本學習新事物的態度是相當認真和徹底的，除生產設備外，還配套購入人事管理、會計等其他制度。筆者曾撰文考察大阪造幣寮的建築規格，發現和於香港銅鑼灣東角（East Point）的香港造幣廠幾乎完全一樣。在人事管理方面，日本更以高薪聘請原造幣廠的全部舊工作班子，包括首長堅達（Thomas William Kinder），及負責溶解、總管、雕刻、會計、醫生、修理等的各級人員。結果，香港的貨幣，無論其成色、規格、樣式，甚至單位名稱全部被引入日本。不過當這些新造貨幣要向海外流通時，英國政府卻兩次拒絕日本的要求，不容許成為香港的合法流通貨幣，以免威脅英國貿易銀元在亞洲地區的流通。（註 21）

## 五、日本在香港發展網絡的挫折

香港成為日本汲取亞洲情報的主要來源已於上文討論。除了情報網絡外，香港對日本的海外移民、開拓海外市場、貿易貨幣之流通等等，都曾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是日本在香港的發展雖然付出很大的努力，但卻遇到不少障礙。

香港於 1894 年發生很嚴重的流行疫症，死亡無數，特別是平民百姓，政府束手無策。由於疫病橫行，很多人都放棄香港，撤離到中國內地居住。由於疫症猖獗造成大量死亡，卻又沒有治療方案，使日本極為擔心，傳染病有可能很快地傳去日本。另外，香港對日本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貿易港口，橫濱、東京、神戶都與香港有緊密的航運交通往來。當時有兩位日本傳染病專家青山胤通和北里柴三郎被日本政府派遣來港調查傳染病菌，（註 22）後來北里柴三郎發現了叫鼠疫的病菌，但有關這一方面的史書記載甚少，因而史學界曾出現爭論，到底香港的鼠疫病菌是由北里柴三郎還是從越南來港的法籍傳染病專家葉赫森（Alexandre Yersin）發現？筆者認為鼠疫病菌最早應由北里發現，但是北里的報告並不完整，因此受批評，後來更引起爭議，最後被後來追上的葉赫森取得國際的承認。（註 23）值得一提的是，最早來港的是青山胤通，而非北里柴三郎，但青山因接觸疫菌而病倒，並沒有完成他的調查研究。很可惜有關他們在港的經歷和對香港醫療的貢獻等重要歷史一直被埋沒。（註 24）

在整個明治時代裏，在香港居住的日本人一直在增加。有趣的是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香港的日本人社會早於 19 世紀末已經出現，現在位於跑馬地的外國人墳場還可見到為數不少的日本人墓碑。（註 25）引起筆者注意的是一些日本婦女，墓碑上沒有名字，出

身於日本北九州的窮困鄉村，俗稱「唐行婦」（karayuki-san）來香港當娼謀生的歷史。（註 26）到底這些人是怎樣來到香港的？到港後又與本國維持一種怎樣的「網絡」關係？她們到香港後是否還會轉移動到其他地方，例如中國或其他東南亞國家？這些問題都很值得我們去研究。現在香港的保良局保存了不少有關日本婦女來港時求助的檔案資料，對我們了解這些被拐賣的日婦問題應有所幫助。（註 27）當時出身於長崎縣的村岡伊平治（1867-1945），被稱為「女街」（即淫媒），於青年時便開始於東南亞多個國家經營俗稱「女郎屋」的妓院。根據這位流浪亞洲日本人的自傳，也曾兩次涉足香港。（註 28）

除了「唐行婦」選擇香港作為海外謀生之地外，日本不少商社亦曾努力拓展香港市場，大力發展海外貿易，香港被認定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基地，但是多年來一直沒有取得滿意的成果，例如：廣業商會於 1878 年來到香港，1882 年撤出；三井物產於 1878 年來到香港，1882 年撤出；三菱汽船於 1879 年來到香港，不到幾年，便於 1884 年撤出等等。還有從香港購買機器、技術和管理人才在大阪生產的日本「貿易銀」，日本政府最早於 1877 年便向香港政府提出成為當地的合法流通貨幣，經多番磋商，雖曾獲港府同意，但兩年後還是被英國政府駁回。綜合而論，日本雖有拓展香港市場的雄心，但卻遭遇極大之挫折。有關這一點，當時的日本駐

港領事鈴木充美曾作以下三點分析，歸納日本未能開拓展香港市場的原因：一者、香港的華商團結力甚高，外人根本無法插入；二者、日本商人欠缺足夠的資本，很容易倒閉；三者、香港的華商直接與日本的製造商聯繫，毫不需要在港的日商作中間人角色。（註29）日本商人在港不敵本地競爭對手，多少反映了香港當時的營商環境是如何排斥外來的商人。

根據學者所指，香港的日本人社會並不團結，分「上町連」、「下町連」兩部分。前者包括政府官員、公司職員及其家屬，後者則主要是一般群眾和小市民，兩個階層互不往來，存有嚴重的社會階層分歧。（註30）有關香港日本人社會內部不和是否造成日本本國商社在香港開拓市場失敗原因，相信還要更進一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一個名叫「香港日本人青年會」的組織，大概於1907年成立，性質有如YMCA（基督教青年會），別小看這個初時只有數十人的小團體，它與上海、臺灣、中國內地、東南亞等國家都保持有聯繫，只是對象只限於日本人而非香港本地青年。

## 六、日本軍政時期的香港

香港作為英治殖民地，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社會分層是鮮明的，當然英國統治者在上，被統治的華人和少數族裔在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個階層中間出現了「夾心

層」，游走於兩個階層之間。在香港超過一百五十年的殖民歷史時期，在香港本土出生的歐亞混血兒（Eurasian），對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宗教等各個領域都發揮過重要的影響。一般來說，歐亞混血兒都有雙重的文化認同。由於特殊的文化背景，他們往往能夠游走於不同的階層、界別，在華洋社會夾縫中扮演「中間人」的角色，說他們是「跨界」的族群亦不為過。不過相對於與日本的「合作者」（collaborator），或稱為「漢奸」的研究與注意還是不夠。有趣的是，在日本軍政占領時期，香港的「親日派」是如果形成和扮演甚麼領導社會的角色？所謂「大東亞共榮」是如果被這些支持日本的「親日派」演繹的？當戰爭結束後，他們並未受到法律上的制裁。到底他們是如何洗脫「投敵」罪名的？有關這些問題，羅旭龢（Robert Kotewall）的個案研究可能有參考價值。（註31）有關香港於日治時期的研究，目前已出現新的趨向，無論在角度和研究方法上均與前不同，（註32）學者的興趣逐漸轉移到當時的文化和教育政策，到底在「大東亞共榮」的意識形態下，這些「日化」教育是如何實施的，本地居民又有甚麼反應？（註33）

香港雖然沒有天然資源，日本侵占香港的目的並非為掠奪香港的資源以支持「聖戰」，而是堵塞香港作為支援內地抗戰的後勤作用。（註34）日本於1941年12月25日

正式占領香港，為了使香港不成為聖戰的負擔，日本當局希望以最少的資源去管治當時尚有接近一百萬人口的香港，所謂「以華制華」是當時被採用的策略，在此策略下成立了「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協議會」（俗稱「兩華會」），希望對已淪陷的香港實施有效的統治。後來證明此策略是成功的，因為在短短的一個月內，兩華會便能組織起來，成功吸納了各界的菁英共 26 人，包括：羅旭龢、劉鐵誠、李子芳、陳廉伯、周壽臣、李冠春、董仲偉、葉蘭泉、伍華、羅文錦、廸啟東、凌康、林建寅、李忠甫、郭贊、陸靄雲、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譚雅士、王通明、鄧肇堅、顏成坤、黃燕清、馮子英、章叔淳。（註35）從兩華會於 1942 年 3 月 30 日創立到 1945 年 9 月 3 日結束，前後共三年半的時間，羅旭龢在此期間為日本人服務，他雖不只一次計畫逃離香港，但都沒有實現。在組成華民代表會之前，羅又是「善後處理委員會」主席，雖然該委員會屬過渡性質，但亦有一定的權責。（註36）

正如日本學者所指，日本軍政當局要羅致這批華人菁英是因為他們多為金融界和法律界的專業人士，與內地的國民黨或共產黨都保持有距離，適合用於對本地華人社會的治理。（註37）日本當政者要在短期內實現有效的治理，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用英治時期的華人菁英，因為他們最容易為廣大華人社會所接受，同時又符合「以華制華」和「大東亞共榮」的原則。（註38）羅旭龢雖然

沒有歐洲人的血統，但在日本人的眼中，這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曾被殖民地政府重用，同時在本地華人社會中有廣闊的人際網絡。根據臺灣銀行於戰時對香港華商的調查，羅旭龢的名字列於「英支混血兒」之列。（註39）不過當羅就任華民代表會主席之後，他的英文名字 Robert Kotewall 被改為 Lo Kuk-wo，這種按照廣東話拼音的寫法和其他華人代表相同。

兩華會雖然成立，但香港仍處於軍政時期，地方治安由軍部負責，而兩華會的成員的舉動統由憲兵隊監察。如學者所指，兩華會內分成兩派，一派是以羅旭龢、李子芳為代表，都是戰前親英份子，另一派是以劉鐵誠和陳廉伯為代表，他們被稱為親日派，較為日方器重。日本當局希望兩派之間互相猜忌，從而加以控制。（註40）1945 年 9 月，英軍重新返回香港，陸續恢復對香港殖民地的管治，對於日治時期香港華人菁英的通敵問題，英方採取靈活變通的策略，對於不牽涉軍事的嫌疑者一律不予搜捕和審判。值得一提的是，曾經參與或目睹日軍統治香港時期所施行各種政策的日本人，於二次大戰結束後有不少人撰寫回憶錄，這對我們了解當時香港社會的情況有所幫助。（註41）

日本對香港的統治方法可謂是「軟硬兼施」，一方面成立「以華治華」的兩華會，另一方面對包括華人菁英和普羅大眾則施行嚴密的監控，慎防他們謀反。例如當時維持公共治安的警察隊和高級管理層全部是

日本人，只有在基層執行任務的低級職位由華人擔任，這和英治時期的香港沒有絲毫分別。比英國人更為嚴格的是，對於一些日常生活上的細節，占領地總督部控制得更為嚴格，例如對可疑的郵件，日軍可進行對收件人的家屋搜查，至於包括小商戶的營業執照、搬遷、離境、添置生產器具、領用特別物資等等，都需填寫各色各樣的表格提出申請，當然並不一定都獲批准。

## 結語

過去學術界普遍認為，由於鎖國的影響，近代日本對外界的認識十分有限，充其量通過長崎這一貿易窗口以了解外界的動態，似乎已欠缺足夠的說服力。在鴉片戰爭以後，香港急速冒升，在城市現代化、汲取西方文化知識、對外交通和資訊網絡各方面，都比日本先進，於是成為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可不參考的對象。

香港是英屬殖民地，是從中國割讓出去的，這一點日本十分清楚，從某個意義上說，香港已成為日本開放的一個警惕。原因很簡單，因為西方列強正虎視眈眈，日本如不欲步上中國後塵，必須面對現實，馬上對外開放，迅速發展成經濟和軍事強大的國家。有趣的是，當日本於 1890 年代攫取臺灣之後，英國對香港殖民地的成功統治經驗，又成為日本政府領導治理臺灣的一個參考典範。（註 42）眾所周知，在亞洲歷史的發

展過程中，歐洲所扮演的角色至為重要，因而過去我們把注意力都放在「歐亞」關係上，從而忽略了亞洲地區的內部關係，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去反思的。（註 43）

香港雖為彈丸之地，但由於種種的歷史和地理因素，香港具有強大的「網絡」功能，影響着中國和廣大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對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可見到香港的網絡作用。其實，香港與日本有着很密切的交往，早於鴉片戰爭結束後的不久已經有日本船來港的蹤跡。從香港開埠到現在的一百七十多年歷史裏，港日關係可謂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總括而言，在 19 世紀香港一直扮演着日本於亞洲汲取西洋文明和觀察中國動態的「中介網絡」角色。在日本實行明治維新以前，可以肯定地說，日本通往世界的交通航線，大多與香港連接亦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日本不得不重視香港。過去有學者提出，二次大戰前日本對香港的研究多以收集情報為目的，筆者並不贊同。（註 44）雖然日本對香港的關注多出於自身的需要，但絕不能把香港研究的成份貶低。相反，如果細心觀察，戰後崛興的香港研究，特別是對於香港中國人社會和亞洲網絡經濟兩方面，都有承繼早於戰前便已奠立的研究傳統。

如果說鴉片戰爭前亞洲的國際關係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來維繫的話，鴉片戰爭便是破壞原來亞洲秩序的兇手，隨朝貢秩序破壞而來的歐洲殖民勢力從印度、東南亞

延伸至東亞，使亞洲的歷史舞台除原有的中國人網絡外，多了來自歐洲的英國網絡。朝貢制度雖然崩潰，但中國人的網絡並沒有消失，華裔移民滲透亞洲每一個國家，利用歐洲殖民勢力，將網絡延伸開去。面對中國和西方於亞洲的強大網絡，日本不可能沒有反應，因此將 20 世紀前半的亞洲歷史解釋為日本對這種網絡壓力的反撲並非沒有道理。基於以上的背景，日本開始挑戰英國在香港、華南的統治優勢，最後更於 1941 年發動太平洋戰爭，實行軍事占領香港，如果我們能追溯歷史便會明白箇中的道理。過去學界多認為日本在香港，華南和東南亞擴張是貫徹從明治維新以來便開始的「南進」政策。（註 45）筆者認為這一觀點並無不妥，在實行「南進」的過程中，顯而易見，日本對臺灣是極為重視的，因此日本對香港的調查研究，相當多的一部分是由臺灣總督府來執行的。不過，從 1938 年廣州淪陷之後，情況便有所改變，此後日本對香港的軍事部署和 1941 年以後日治時期對香港的統治便全部由軍部來控制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陸軍和海軍之間，對香港、澳門、華南、東京灣一帶的統治策略未必是一致的。當然我們知道最後的結果是由陸軍來主導，把香港緊緊控制於一個封閉的環境中，這樣便把香港與前述周邊地區的關係完全割裂開來，不過這已超出本叢書的討論範圍，希望以後可以另外撰文探討。

## 【註釋】

1. 可兒弘明編，《香港および香港問題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店，1991 年），頁 227-229。
2. 參考李培德編，《香港史研究書目題解》（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
3. 例如：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編，《香港兵要地誌》（東京：日本陸軍參謀本部，1938 年）；玉井政雄，《香港戰地抄》（東京：六藝社，1942 年）；清水國光，《香港擊滅前後》（東京：晴南社，1944 年）。
4. 例如：《鐵窗見聞錄：赤柱監獄收容邦人座談會》（1942 年）、《新香港の建設》（1942 年）、《管區法令填報須知》（1942 年）；《戶口事務便覽》（1942 年）、《香督令特輯》（1942 年）、《自動電車從業員日語集》（出版年不確），這類書和其他中小學教科書和雜誌等，作為戰時「香港市民圖書館」的藏書，於戰後由香港大學馮平山中文圖書館接收，目前在日本較不容易找到。
5. 濱下武志，《香港：アジアのネットワーク都市》（東京：筑摩書房，1996 年）。
6. 岩下哲典、真榮平房昭，《近世日本の海外情報》（東京：岩田書院，1997 年）。
7. 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國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 年）。
8. 詳見王曉秋，《近代中日啟示錄》（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年），頁 8-16。
9. 片山邦雄，《近代日本海運とアジア》（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96 年），頁 15-27。
10. 沈國威、內田慶市編著，《近代啓蒙の足跡：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触，「智環啓蒙塾課初歩」の研究》（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2002 年）。
11. 沈國威編著，《「六合叢談」（1857-58）の学際的研究：付・語彙索引・影印本文》（東京：白帝社，1999 年）；松浦章、內田慶市、沈國威編著，《遐邇貫珍の研究》（吹田：関

- 西大学出版部，2004年）。
12. 卓南生，《中国近代新聞成立史，1815-1874》（東京：ぺりかん社，1990年），頁78-101。
  13. 例如銀行等經濟、金融詞彙便源出於該套字典，參閱立脇和夫，《在日外国銀行史》（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1987年）。
  14. 詳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羅森著〈日本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29-46。有關羅森與香港關係，可參考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驅羅森〉，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日本學》第五輯（1995年），頁141-151。
  15. 陶德民，〈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對日人權外交的啟示——寫在日本開國150周年之際〉，《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年4月號，頁48。
  16. 衛斐列著，顧鈞、江莉譯，《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08-109、130、136。
  17. 羅香林，〈香港開埠初期文教工作者羅向喬事蹟述釋〉，《包遵彭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71年），頁289-293。
  18. 參閱斯波義信編，〈函館華僑關係資料集〉，載《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第22號（1982年），頁5-7。
  19. 參閱岡田俊平，〈日本円銀の海外流通策—香港を中心として—〉，《成城大学經濟研究》，第6号（1956年9月），頁101-128；Takeshi Hamashita,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silver yen and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1871-1913,” in Frank H. H. King (ed.), *Eastern Banking: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3), pp. 321-349.
  20. 參閱李培德，〈香港造幣廠與大阪造幣局〉，載蔣永敬等編，《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2年），頁573-589；李培德，〈明治日本に於ける貨幣の改革と香港〉，《季刊歷史海流》，第3卷第3號（1997年7月），頁19-28。有關的過程，可參閱本叢書附錄〈香港日本關係大事年表〉。軒尼詩在日本被稱為「香港太守」，他的演講記錄被鈴木五郎翻譯成日文「香港立法會議に於て」，收入由他主編的『歐米大家演說集』頁64-66，於1888年在大阪出版。
  21. 李培德，〈香港造幣廠與大阪造幣局〉，頁587-588。
  22. 可見弘明，〈北里柴三郎の香港〉，《三田評論》，第727号（1973年6月），頁86-90；飯島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東京：研文出版，2000年）。
  23. Pui-Tak Lee, “Colonialism versus Nationalism: The Plague of Hong Kong in 1894,”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10, No. 1 (Summer 2013), pp. 97-128.
  24. 有關青山胤通所著《香港百志土略報》的介紹，參考李培德，〈香港におけるペスト日本の発見〉，《季刊歷史海流》，第3卷3号（1997年），頁37-41。
  25. 參考赤岩昭滋，〈香港の日本人墓地—船員の墓碑を中心として—〉，《海事史研究》，第21号（1973年10月），頁66-81；岩下哲典，〈香港墳場の日本人墓地研究資料について〉，《明海大学教養論文集》，第19号（2007年12月），頁46-64；羅燕妮、陳文耀，〈從香港日本人墓地碑文看日本人在香港活動之歷史轉變〉，李培德編著，《日本文化在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7-64。
  26. 陳湛頤，〈香港早年的日本娼妓〉，載原武道、陳湛頤、王向華編，《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133-152。

27. 可兒弘明，《近代中国の苦力と「猪花」》（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
28. 陳湛頤編譯，《日本人訪港見聞錄（1898-1941）》（香港：三聯書店，2005年），頁95-106。
29. 奧田乙治郎編，《明治初年に於ける香港日本人》（臺北：臺灣總督府熱帶産業調査會，1937年），頁276-281。
30. 飯島涉，〈香港——日本關係のなかの香港日本商工會議所〉，波形昭一編著，《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經濟団体》（東京：同文館，1997年），頁192。
31. 參考李培德，〈戰時における香港の『欧亚混血児』——羅旭蘇の変節問題を例として——〉，《中国研究月報》，第66卷11号（2012年11月），頁38-47。
32. 過去的成果多集中經濟方面的，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對香港的政策，例如松本繁一，〈日本軍政期の香港經濟〉，《アジア經濟》，第17卷1・2号（1976年1・2月），頁42-56；梶井義雄，〈横浜正金銀行香港支店の戰時活動〉，《松山商大論集》，第33卷4号（1982年10月），頁63-89；太田弘毅，〈日本軍政下の香港に進出した企業会社〉，《政治經濟史學》，第250号（1987年2月），頁146-161；小林英夫，〈太平洋戦争下の香港——香港軍政の展開——〉，《駒沢大学經濟學論集》，第26卷3号（1994年12月），頁209-281；長野雅史，〈日本占領期香港における人口疏散政策〉，《史苑》，第55卷2号（1995年3月），頁37-52。
33. 參考齋藤正雄，〈日本占領期における香港の日本語教育〉，載余均灼、陳志誠等編，《日本語教育・日本研究論文集》（香港：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1995年），頁104-120；張慧真、孔強生，《從十一萬到三千——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畑澤桂子，〈日本軍政下の香港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と日本語教育機関〉，載余均灼、陳志誠等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第一卷（香港：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2008年），頁10-18；山田美香，〈日本占領時期香港の教育〉，《名古屋市立大学人間文化研究》，第12号（2009年12月），頁113-125。
34. 中國於1937年對日作戰，但香港的英國殖民地政府卻宣布中立，香港成為包括軍事和經濟支援抗日戰爭的最重要後援補給基地，就算在政治和外交上香港亦有助中國向全世界宣傳，這樣便引起日本的戒心。因此，一些批評中國的政治性讀物便應運而生，1938年由武村與志夫著，《支那操る宋美齡の正體——香港外交界に躍る妖怪——》於東京出版，宋美齡被醜化為操控中國的「妖怪」。
35. 華民代表會的成員包括羅旭蘇、劉鐵誠、李子芳、陳廉伯，另外由王德光任經理，只有王德光一人為華民各界協議會的成員。
36. 參考譚汝謙，〈“Asia for Asians”: Cultural Control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1941-45〉，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頁735-769。
37. 滿鐵上海事務所，《香港在住支那人有力者調査表》（1940年2月）。
38. 1941年9月10日這批華人菁英為慶祝香港開埠一百週年的時候高唱“God Save the King”，想不到數月後他們改唱“Banzai”，揶揄他們對統治者的「奴性」，見Robert S. Ward, *Asia for the Asiatics?: the Technique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5), p.64.
39. 臺灣銀行調查課，《南支調查資料蒐錄》，第3卷（臺北：臺灣銀行，1942年7月），頁159。
40. Wing-Tak Han, “Bureaucracy and the Japanese



-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in William H. Newell (ed.), *Japan in Asia, 1942-194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8-19.
41. 参考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占領下の教會に召されて》（大阪：創元社，1970年）；和田久幸助，《日本占領下香港で何をしたか：証言昭和史の断面》（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
  42. 吳密察，〈外國顧問 W. Kirkwood 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編，《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3年），頁 1-27。
  43. 參閱濱下武志，〈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香港の位置〉，《創文》，第 320 號（1991 年），頁 4-5；濱下武志著，《香港——アジアのネットワーク都市》（東京：筑摩書房，1996 年），頁 65-66。
  44. 陳湛頤，〈日文香港研究著述的回顧〉，《二十一世紀における日本研究》（香港：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1999 年），頁 153。
  45. 參考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東京：千倉書房，2005 年）；後藤乾一，《アジアから見た近現代日本：「南進」・占領・脱植民地化をめぐる歴史認識》（東京：岩波書店，2012 年）。